

“词语是普遍存在的、永恒的，是大家是每个人所共有的，是我所知晓并激越我的唯一的有力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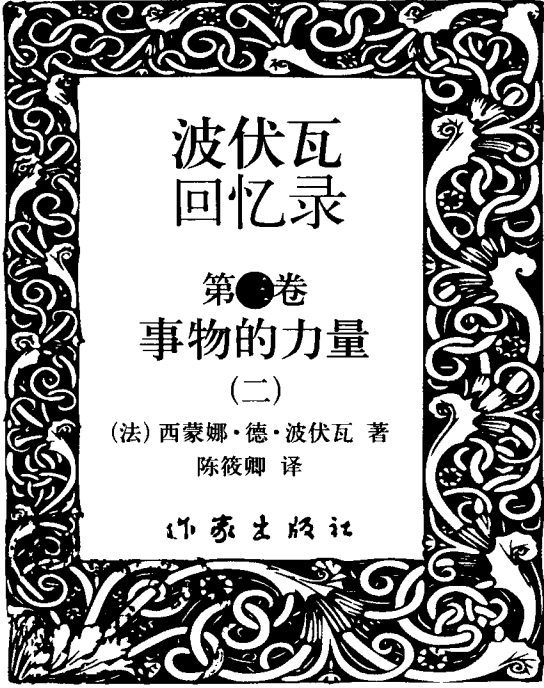
波伏瓦 回忆录

第三卷 事物的力量 (二)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陈筱卿 译

Simone de Beauvoir
La force des choses II

作家出版社



波伏瓦
回忆录

第●卷
事物的力量
(二)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陈筱卿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1-8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伏瓦回忆录.第3卷,事物的力量.2/(法)波伏瓦(Beauvoir, S.D.)著;
陈筱卿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3.1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5063-6505-5

I. ①波… II. ①波…②陈… III. ①波伏瓦, S.D.(1908~1986)-回忆录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9666号

LA FORCE DES CHOSES II
Simone de Beauvoir
© Editions Gallimard, 1963

策划: 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Centre du livre étrangère des Editions Mer-Ciel

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 des Programmes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européennes

波伏瓦回忆录.第3卷,事物的力量(2)

作者:(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译者:陈筱卿

责任编辑:王妍 周茹 翟婧婧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数:360千

印张:22.5

版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505-5

定价:36.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六章	/1
第七章	/53
第八章	/79
第九章	/99
第十章	/169
第十一章	/275
尾 声	/337



第六章

年轻女子到了不再年轻时，对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是极其敏感的。她们会说：“我不明白，年过四十之后，怎么还要把头发染成金发，怎么还穿比基尼，怎么还同男人打情骂俏。等我到了这个年龄……”这个年龄终于到了：她们照样染金发，照样穿比基尼，照样向男人频送秋波。我在三十岁时也这么下过决心来着：“过了四十，女人就该别再去谈什么恋爱了。”我讨厌那种我所称之为的“黄脸婆”，而且我还对自己说，一旦到了那个时候，我便修身养性了。但是，尽管信誓旦旦，等我到了三十九岁时，我还是在谈情说爱。现在，我已是四十有四的人了，已是人近黄昏的时节了，但是，我说了，如果我的肉体同意这种看法的话，那我的脑袋却不愿隐忍不发。若是再次遇有好的机缘的话，我是会抓住不放的。

7月过去了。我将开车前往米兰，萨特将乘火车去那儿与我会合，我们将在意大利穿行两个月。不过，博斯特和科被出版商纳热尔派去巴西搜集材料，准备编写一本旅行指南，所以他们俩正在异常高兴地准备启程。他们买了白色的无尾常礼服；博斯特还邀请我们去吃蔬菜鳕鱼，为他们送行。我还建议博斯特把克洛德·朗兹曼也叫上。我们一直吃到很晚，还喝了不少的酒。翌日清晨，我的电话响了，是朗兹曼打来的，他说道：“我想请您去看电影。”我问道：“看电影？什么电影呀？”他回答说：“随便什么电影都行。”我有点犹豫。我最后那几天的日程排得很满，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拒绝。于是，我们便约好了时间、地点。但是令我大为惊讶的是，我刚把电话挂上，眼泪便哗哗地流了下来。

五天之后，我离开了巴黎。当我发动车时，朗兹曼站在人行道边上，向我挥手告别。有点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深信有点什么事情开始冒头了。我又找回了自己的肉体。我为离情别绪所困扰，竟然在城外迷了路，不知

往哪儿开好，后来，我上了七号国道，很高兴一条大路在向前延伸，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回忆、去想象了。

第三天，当我离开在那儿投宿的多莫多索拉时，人就像是在梦中一般；车上有两位女乘客，是两位年轻的英国女子，她们是从加莱搭顺风车去威尼斯的，口袋里装着一张慕尼黑到伦敦的返程机票。马热尔湖一带正在下雨，我的车打滑，把一块路牌给撞倒了。她俩倒是还算镇静。几个意大利男人把我车的挡泥板弄弄好，并且还替我解围，说是这段路的路况极差，车祸频繁发生，但是这一惊远没有让我头脑清醒，反而让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我在一个十字路口放下了那两个英国姑娘，便驶入米兰城内，开着车四处寻找修车处，突然间，我发现右边的车门没有关上，啪啪直响。我正用手去够右车门，车却冲上人行道了。我一边停车，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是昏了头了。”这时我才发现我座位旁边的包不翼而飞了，包里可是放着我的所有证件和不少的钱呐。我把车子撂在那儿，飞快地往回跑去。只见一个骑车的人正举着我的包向我迎来，一脸不屑地看着我。

我终于把车交给了一个修车工，我便来到斯卡拉咖啡馆，见到了萨特，脑子也清醒过来了。不过，到了下午，车修好了，我又握上了方向盘，这时，我又有些不安了。我在想，这种新的旅行方式他会感兴趣吗？我担心自己手潮，他会对此感到厌烦。但是，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在城市里，我那笨手笨脚的驾车技术并没让他不耐烦。在公路上，他仍然那么平静，但是，遇到几个讨厌的意大利人故意超到我前面又慢腾腾地不快走，他便会喊叫道：“超过他们去，快，快。”开车的那个意大利人在加速，或者是在走“之”字形，不让我超越，只要我超不过去，萨特就吵吵个没完；不过，如果我真的照他的话去做，我们一定会死上百次，我宁可这么小心谨慎地驾驶。

从克雷莫纳到塔兰托，从巴里到埃里切，我们又一次熟悉了意大利：我们参观了曼图亚城和曼特尼亚的壁画、费拉拉的绘画，参观了拉文纳城、乌尔比诺城以及乌切洛的画作，还参观了阿斯科里广场、阿布鲁齐的教堂、马特拉的穴居人、阿普利亚的圆柱石建筑、莱切和西西里岛上诺托的巴洛克建筑。最后，我们去了阿格里琴托；我们重游了塞琴斯特、锡拉丘兹。我们穿越了阿布鲁齐。我们坐高山缆车到大萨索山的顶峰，看到了墨索里尼曾经被囚禁的那个灰暗的旅馆。多亏了这辆车，我们用不着再受时间的限制了，我们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了。不过，萨特说，我们有所得但也有所失，我同意他的看法。我们抵达一座城市中心时不再像以前那样

惊奇兴奋了；如果我们乘火车来的、乘飞机来的，那么到达一座城市就像是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似的；当你驾车前来，一座城市对你来说就等于是一个阶段，是前往下一个城市的中途停靠站，而不是一片新的天地；城市的街道只是公路的延伸，它们通向其他的公路；城市也就失去了其新颖之处，因为它的墙壁的色彩、它的广场和房屋面墙的设计早就在城郊小镇上出现过了。不过，这倒也很不错，因为城市虽然不那么让你激动不已了，但你却能更好地了解它。我们在看到意大利南方的贫穷之后，就更加真切地了解了那不勒斯。我们进一步地熟悉了农村；我们在一座座村庄停留，同意大利的雇工们混在一起，他们坐在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什么也不喝，一脸的无望无助。常常有人在公路上胆怯地向我们招手，我们便停下车来把他们捎上。他们大多数是失业者，问我们是否能在法国帮他们找到活儿干。

此外，自驾车旅行还让我们看到一些令人惊奇的事。那天是8月15日，我们一大早便从罗马出发，前往福贾。我们在大太阳下开了一整天，不时地因遇上施工和路障而停下。夜幕降临了；在随后的两个小时里，意大利人开的车子的大灯照得十分晃眼，弄得我筋疲力尽。到了卢切拉，我们停下车来，想找个地方喝点什么。我们把车子停靠在城墙边上，进到城门外，突然发现，到了一个灯光辉煌的大厅里，有人在跳舞，大厅的天花板没了，夜空明星可见；出了这个厅，又有一连串的大厅，其实是一个广场隔开来的，各个大厅里都有乐队在伴奏，有人在跳舞，厅内灯光亮如白昼。

那个夏天，意大利全国的气温几乎都高达四十度。萨特仍在写他的《共产党人与和平》。他想写作，而我则想观光游览：我们已经互相迁就了，不过这对双方仍然是一种痛苦。我们或步行或开车游览、散步、远行，一直走到下午，热得我们够呛。当我们疲惫不堪地回到各自的房间时，那里面也闷热难耐，但我们并没忙着歇息，而是坐在桌前，拿起笔来。可我不止一次地丢下笔，把晒得通红的脸埋在凉水里。

归途中，我在米兰我妹妹那里待了几天；我读了帕韦泽的日记，并把它带回了巴黎，准备在《现代》上刊载它的节选。

在这个假期里，朗兹曼去以色列兜了一圈，其间，我们彼此有书信往来。他在我回巴黎之后的两周也回来了，我们又异常高兴地重逢了。我们互叙往事，开始构建我们的未来。为了表明身份，他一开始就说：“我是犹太人。”这句话的分量我很清楚，但是我的犹太人朋友中没有谁让我完

全理解这个词的含义。他们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一直只字不提，至少是在同我的关系中是这种情况。朗兹曼强调了自己的这种身份，这种身份支配着他的一生。

他孩提时期就很有抱负，他父亲常常摊开世界地图，自豪地对他说：“我们无处不在。”十三岁时，他看到了反犹太主义，大地在抖动，一切都崩溃了。但他仍旧在说：“是的，我是犹太人。”闻听此言，交谈者立刻打住话头，突然变成了一头又盲又聋又凶恶的野兽，他觉得让对方发生这种变化的责任在他自己。从此，“犹太人”这个词儿便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概念，他感到自己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以至于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答才是，是回答“是”还是“不是”？他在自己正值遵守习俗的年龄被人视做异类，这给他的一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多亏了他的早期的抵抗运动成员的父亲，他才恢复了自豪感。他本人也在克莱蒙-费朗中学组织了一个小组，自1943年10月起，与敌人打游击。因此，他的经历让他明白了犹太人并非逆来顺受之辈、并非忍辱负重之辈、并非卑贱之辈，而是勇敢的斗士。被残忍杀害的六百万男女老少，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并不是前世注定的受难者，而是一种无端暴行的受害者。每到夜晚，每每想起那一桩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会流下愤怒的眼泪，致使他对刽子手及其帮凶怀着深仇大恨，他感到自己的孤独是被别人强加的，他仍愿意做一个犹太人。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名字让他心里充满着自豪。每当发现哪位名人是犹太人时，他就满面放光。即使是今天，当有人赞颂伟大的苏联物理学家朗多而又不说他是犹太人时，他便会愤恨不已。

尽管在他们中间他有许多朋友，但是，他对这些“异教徒”仍然心怀愤恨。他跟我说：“我时时刻刻都想要杀人。”我感觉得出来，在他内心深处，他骨子里埋藏着一种暴力，随时都准备爆发出来。有时候，早晨醒来，由于做了噩梦，他会大呼小叫：“你们都是魔鬼！”他以种种调侃、恶言、疯狂在抨击我们的世界。二十岁时，他还是路易大帝中学的学生，竟然租了一件教士袍，挨门逐户地去有钱人家募捐。不过，这只是他的一时之举，偶尔为之。他怀念自己的孩提年代，那时他虽说是个犹太人，但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人们把他撕成了一块一块的，世界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他试图将自己拼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让自己回到恢复秩序的世界中去。二十岁时，他相信文化的世界性，而且他还满怀热情地努力使自己适应这种文化，因为他觉得它还不完全属于自己。他寄希望于具有亲和力的真理，但是人们仍旧带着情绪和功利对待他，而且人们还是

四分五裂的。他无论是通过理解还是通过理性都无法克服自己的孤独情绪。他离群索居，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对这种非他之过的出身所遭到的不幸愤恨不已。他知道，无论自己的内心怎样想方设法，他都无法逃脱这一状态：他只有依靠一种客观的必要性才能得救。他觉得马克思主义如同他自身的存在一样是真实的。它向他展示了人类的冲突是可以理解的，这使得他从主观性中摆脱了出来。他和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一致的，并且从他们的目标中看到了自己的梦想，因此，他怀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相信共产党人，而他的这种乐观主义是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的反面，这使我有时感到十分恼火：他需要一个欢乐的明天，以补偿他所遭受的痛苦。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甚至很精明的一个人，竟然有着这种善恶二元论的思想，不禁让我颇为惊讶。他经常为此而自责，但却又无法摆脱，竟至一再地陷入其中。他被剥夺了一切，所以他不能忍受再被剥夺任何东西。因此，他在其对手们的身上，看到的是绝对的恶，他认为“善”的营垒应该毫无瑕疵，这样才能重建天堂。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我讨厌这种前景。同情，甚至是无条件的同情，与介入之间，有着一种无法跨越的距离，因为在他看来，什么都并非很真实，特别是他自己。在他孩童时代，人们迫使他否定他的“犹太性”或他的个性，因此，他的“自我”被人们偷走了：当他在说“我”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在进行欺骗。

他因为没有任何的参照，所以很容易接受他所尊敬的人的观点，但是，他也是个固执、刻板的人。他仅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欲望，无法抑制自己头脑中的暴力倾向，其实，他也不愿意这么做。他不屑于循规蹈矩，以致悲伤时竟然泪流满面，怨愤时竟至口出恶言。萨特、我及我的大多数朋友，我们都是清教徒，我们常常要压制自己的情绪，感情不太外露。朗兹曼这么爱冲动我很不习惯。不过，正是他的这种直率我才觉得他更可爱。我也同他一样，疯狂起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制订好计划无论如何也得执行。我往往也会大哭大号，今天我仍在内心深处怀念往日的那些疯狂劲儿。

作为一个犹太人，又是长子，朗兹曼自孩童时起就肩负起种种责任，致使他小小年纪便开始成熟了；他有时候甚至像是肩上压着一种祖先经历的重担：我在同他聊天时，从未想到他比我小。不过，我们心里都明白，我们俩之间年龄相差十七岁，但这并未妨碍我们的交往。对于我而言，我需要有点差距才能让我的心有所寄托，因为我不想重复与萨特之间的那种

默契。艾格林属于另一个大陆，朗兹曼属于另一代人：这也是一种差异，但它使我们的关系得以保持平衡。他比我年轻，这使我只是占去他生命中的一个短暂时期。这就让我觉得我今天不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他是情有可原的。再说，他也没要求我这么做：他接受了我的一切，包括我的过去和现在。但是，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很和谐。12月份，我们去荷兰玩了几天，我们沿着结了冰的运河漫步，我们在拉上窗帘的小酒馆里喝阿德活卡特酒，我们聊个没完。我每年都要同萨特共度的假期有点让我犯愁：我不想放弃与萨特共度假日，但是与朗兹曼一别两个月又会让我们挺难受的。于是，我们商量好，朗兹曼每年夏天来同我和萨特一起待上半个月。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一切的焦虑不安，以及最后的那些疑虑全都烟消云散了。等我们回到巴黎之后，便决定在一起生活了。我以前很喜欢孤独，但我对此并不感到遗憾。

我们的生活安排有序。上午，我们同时写作。他从以色列带来一些笔记，想以此为基础写一本游记。他对这一趟以色列之行感触很深：在以色列，犹太人并不是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人，而是一些享有权利的人；他不无自豪却又挺反感地发现，有犹太人的船只和一支犹太人海军存在，有犹太人的城市、田野和树林，有富有的犹太人也有穷苦的犹太人。他的惊奇让他反躬自省。他把自己的这种感受详细地说给萨特听，于是萨特便建议他在自己的书里既谈以色列又说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朗兹曼觉得萨特的这个建议正中下怀，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只有二十五岁，缺少写自己所必需的那种洞察力。他开头写得很好，但是却碰上了一些心理障碍，不得不停下笔来。

有朗兹曼在我身边，我忘了自己的年岁。首先，他的存在使我的种种焦虑一扫而光：有这么两回，他发现我为此而烦恼，害怕得不得了，于是我便打定主意绝不向焦虑烦愁低头，因为我觉得让他年纪轻轻地便体验到日暮黄昏的恐怖，实在太不像话了。再者，有他在，我又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感到兴趣了，而在这之前，我的好奇心早已大大地收敛了。我活在一个资源有限、大大小小的灾难缠身的地球上，而且我自身也是一种有限的存在，包括我的处境、我的命运、我的事业都是有限的，凡此种种，限制了我的欲望。从前那个我什么都想获得的时期早已离我远去了！现在，我依然关心所发生的事情——书籍、电影、绘画、戏剧等等，但是，我更注意的是掌握、深化、完善我以往的种种经历。我以往的经历对于朗兹曼而言，都是新鲜的，而他以意外的眼光看待着它们，这使我眼前一亮。多亏

了他，无数的东西——喜悦、惊奇、焦虑、欢笑和清新世界——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前两年，世界前途渺茫，我自己也在爱情上遇到挫折，而且身体也出现异常，现在，幸福终于又出现在我眼前了。战争阴云消散，我又沉浸在个人生活的欢乐之中。

我们仍像以前一样地去看望萨特，但我们的习惯有所改变。几个月前，有一次我突然被一阵奇特的响声惊醒了，好像有人在轻轻地敲鼓一样。我立刻打开灯，天花板上有水在滴，滴在一张皮扶手椅上。我去找门房投诉，后者通知了房屋租赁公司，公司又通知房主，可我的房间里仍在“下雨”，东西在慢慢地发霉。当朗兹曼同我住在一起时，家具上、地板上堆满了书。在这个房间里，我们仍然能够写作和睡觉，但是在里面居住还是挺不舒服的。从那以后，我便同萨特在蒙帕纳斯大街的“帕勒特”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有时候也去“法尔斯塔夫”，它使我们回想起我们的青年时代来。我还经常同朗兹曼或奥尔加去街心公园对面的布什里饭馆用餐，我大部分的约会都安排在那里。经常光顾这儿的是一些左派知识分子。透过饭馆的玻璃门可以看到巴黎圣母院和草地，留声机里在轻轻地放送《勃兰登堡协奏曲》。萨特同我一样很高兴我邀请小圈子中人——奥尔加和博斯特、旺达、米雪尔、朗兹曼——一起在“布什里”欢度除夕夜。我们之间心灵相通，只需一个微笑，互相之间都明白了，用不着说一大堆套话。我们在这个小圈子里一起说说话是很惬意的事。这种默契一旦缺失，什么事都谈不拢，常常费尽口舌也徒劳无益。我已经失去了对临时碰个头的兴趣了。莫妮克·朗热建议我同福克纳一起吃顿饭，可我拒绝了。萨特在米雪尔家同毕加索、卓别林（我在美国结识的他）一起吃晚餐的那天晚上，我没去，我同朗兹曼一起去看《灰光灯》了。

春天给我带来了喜悦：《第二性》在美国发行，好评如潮，污言秽语抹不去它的成功。这本书在我心中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很高兴地看到，每一次该书在国外发行时，都证明了它先前在法国出版时所遭遇到的非议并非我之过，而是读者们的错。

3月末，我同朗兹曼一起去了圣特洛佩兹，他领我穿越了他当年打游击的丛林。一些高大的土堆尚在，它们仍挡着马热里德的一条条小路。我们在“艾欧利”与萨特会合；米雪尔带着孩子们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广场边。我们同萨特在塞内克埃的露天座上聊天时，与梅洛-庞蒂以及在加桑有一幢房子的布拉瑟在这一年中又一次相逢了。他请萨特帮他改编大仲马写的《金恩》，萨特一向喜爱情节剧，所以爽快地答应下来。晚上“艾欧

利”的餐厅里炭火熊熊，我们畅谈着。遗憾的是，这家漂亮的旅馆不久便一片萧条衰败了，因为满头银丝、身着高领套头衫、略施脂粉的高雅的女主人克洛太太被指控是一起勒索案的同谋。1954年，当她的照片刊登在各家报纸上时，我简直认不出报上那面容憔悴的老妇人竟然就是她。我领着朗兹曼领略了摩尔、埃斯泰雷尔、海滨和悬崖盘山公路的风光。我们一边开着车，一边聊着我让他读过手稿的我的那本小说。他思维敏捷、细腻且尖锐，他向我提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并坚持己见，让我茅塞顿开。我开始时还有点受不了，但随后我便感觉到他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对这本书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从挪威旅行起，我就从头至尾地对它大加修改了，因为1952年秋末，萨特在重新阅读它的时候，对它仍不满意。我很讨厌小说的种种清规戒律，所以我并不是心悦诚服地在顺应它们。这么一来，小说就这儿太长、那儿太短，结构不完整，对话也不贴切。我想着写一些特殊的个人，让他们既带着确信又心存疑虑，不停地被别人以及他们自己所反对，他们时而目光敏锐，时而天真幼稚，时而偏见固执，时而真挚坦荡。可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在塑造人物，倒像是在阐释一些思想。也许真的是不可能把知识分子当做主人公，或者至少这项任务非我力所能及……我狠了狠心说：“干脆别去弄它了。”萨特则劝我道：“还得写下去。”但是他的担心比他的鼓励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倒是博斯特和朗兹曼说服了我，让我坚持写下去。他们是头一次读到它，所以对书中的长处比其缺陷更加敏感。于是，我便重新写了起来。但是，在这最后一年的劳动中，我往往焦虑不安，因为老有人在问我：“您不再写了？”还有人挖苦地说：“她为什么不再写了？因为她早就江郎才尽了……”每当我看到笔头很快的一位作家的新书出版时，我心里总不免会有所嫉妒。

萨特于11月份在《现代》上发表了她的论著《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二部分，在文中明确地阐述了他与共产党保持一致的程度与理由。他去了维也纳，归来时向我们详细地叙述了“和平拥护者大会”的情况。他与俄国人通宵在一起喝伏特加。相对而言，共产党人来的很少，只有百分之二十。许多参会的代表并未获得本国政府的允许：有些代表为了离开日本、印度支那，只好偷偷地绕道长途跋涉；还有一些代表，特别是埃及代表，是冒着回国后会被关进监狱的危险前来的。法国除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外，其他代表很少，而萨特曾希望说服的左派知识分子没有参加大会。我同朗兹曼一起前往伊夫赛车场听了代表们讲述自己的经历。看到萨特同杜克洛并肩而坐，还点头微笑，我感到怪怪的。我在想，共产党人对

此也会颇为惊讶。负责向大会介绍萨特的这位负责人颇有点犹豫地说：“我们很高兴让-保尔……”见他略有迟疑，到会的人便以为他会接下来说出被介绍者的姓氏——“大卫”来。等他镇定下来，萨特已经从他手中拿过话筒来了。每当听见他在大庭广众中讲话时，我总不免会十分激动，想必是因为这些专心听讲的听众与我们之间所存在的距离所致吧。话语从他口中轻松自如地传到听众们的耳朵里，但是我每每会产生一种不可靠的奇迹的感觉。他把不敢前来维也纳参会的左派人士狠狠地挖苦了一通，听众们听了十分过瘾。他还指责了马蒂内和斯特凡，斯特凡就坐在我的前面一排，我看着他在听萨特的指责，还不时地扭过头来冲我苦笑一下。

《现代》的同仁们大部分都赞同萨特的政治观点。他叙述过^①他同梅洛-庞蒂的关系是怎么变糟的。许多人因为政见大相径庭或害怕连累自己而或公开或悄悄地远离了萨特。他在弗里堡曾经作过一次讲演，最近他又去了那儿，但却受到了冷遇。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法兰西学院院长的夫人一边走出大礼堂一边说道：“我上过当了，没人能够让我再上当了！”在听他演讲的一千二百名学生中，只有五十人听得懂法语，勉强能跟得上他的讲话。其中的一个学生说：“我们能听懂他的观点，但对他举的那些例子就听明白了。”他们觉得他太靠近马克思主义。萨特前去拜访了寓居其“鹰巢”的海德格尔，后者对他说他对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新近出版的写他的那个剧本感到很痛心^②。他们俩只是一直谈论这个话题，半小时之后，萨特便告辞了。萨特告诉我说，海德格尔简直是在传播秘教，随即，他又瞪圆了眼睛补充道：“您想想看，四千名教师和学生整天在听他絮叨海德格尔，简直是活受罪！”

最后，他决定亲自撰写那本力挺亨利·马尔丹的书的大部分内容。一些朋友为他担心：他就没有别的更好的事情干了？在“古代”——战前，我也是这么想的。可今天，文学对我而言已经不再那么神圣了；而且，我知道萨特之所以选择了这种道路，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此需要。我耳朵里充斥着人们对他的建议和批评，我觉得都纯属废话，说什么：“他应该写完他的小说。他真的是时候写出他的伦理学著作了。他为什么现在沉默不语？他为什么以前要说？”我们不能置身其外地去评价一本著作在其中

① 见《活着的梅洛-庞蒂》。——原注

② 《弗洛雷斯担尺度》是一个讽刺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的剧本。该剧只是在第二年才在广播中播出，不过，此前已经有公开朗读。——原注

展开的那些条件：当事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了解自己应该怎么做。此刻萨特应该做的就是打破许多东西，以便从中发现其他一些东西：“我以前读过，我现在得把读过的东西重新读一遍。我只有—条主线，但这就足够了，那就是阶级斗争那条取之不尽却又是艰难的经验。我重新阅读了。我脑子里仍有些疙瘩，我想法解开它们，但确实很费力。”^①他重读了马克思、列宁、罗莎·卢森堡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他就这样在准备继续写《共产党人与和平》。由于勒福尔曾经在《现代》上撰文批评过他，因此他写了一篇长文予以回复。

萨特的新立场令朗兹曼开心异常。朗兹曼认为政治比文学更重要，而且我已经说过，他之所以没有加入共产党，那只是因为一些主观的原因。当他看完《名士风流》的初稿时，他便一个劲儿地说服我要更清楚地解释亨利和杜布勒伊保持与共产党人之间的距离的原因何在。在此之前，在我看来，这些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无需赘述。我并没有反对萨特现在的做法，但是，他也没能说服我跟他的观点相—致，因为我是从我的出发点去判断他的转变的，我担心他为了靠近共产党而过分地偏离自己的真理。可朗兹曼则完全不这么认为：他把萨特向共产党人迈出的每一步都称之为进步。从一开始他的观点就十分明确，而且天生地就在以共产党人的眼光看待问题，所以他总迫使我解释我自己的观点，可这时我已经习惯于问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每天每日都在对抗我最本能的反应，也就是说反对我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他逐渐地，—点—点地打破我的防线，而我则不得不抛弃我的理想主义的道德观，最后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萨特的观点。

然而，与共产党人携手共进而又不放弃自己的判断，并不比1946年时容易，尽管法共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萨特对共产党内部的种种困难，对清除马尔蒂、清除蒂隆都没感觉到与自己有关。但是，他却对一些事情感到难以接受，比如：布拉格审判，苏联猖獗的反犹太主义，埃尔韦在《今晚报》上发表的那几篇反对在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斯大林逮捕所谓的“医生凶手们”。他接待了一些犹太人共产党员的来访，他们要求他表明自己的立场。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上要求他谴责斯大林对犹太人的态度，于是，萨特便在《观察家》上回复道，他在合适的时机这么做。如果事态的发展没有突然变得严重起来的话，他很可能不得

^① 见《活着的梅洛—庞蒂》——原注

不同他的新朋友们怒目相向。有一天，萨特与阿拉贡约好一起吃午饭，只见阿拉贡晚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萨特那儿，连胡子都没刮，显得慌乱不堪的样子，原来是斯大林逝世了。马林科夫立刻释放了那些被指控的医生们，并且在柏林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在那几周内，无论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还是在世界上，人们议论纷纷，各种假设、评论、推断层出不穷。萨特很奇怪自己反倒感觉轻松了！他所期待的和解终于有望了。佩茹就斯兰斯基案件^①的文章在《现代》上发表了，但并未遭到共产党人的抨击。

在印度支那，战争仍在继续。北非局势动荡。经过两年的和平努力，希望渺茫，布尔吉巴只能依靠暴力来使突尼斯获得独立。他的被捕^②在全国引起了总罢工，引发了骚乱；在镇压邦角城的行动中，有两万人被捕，恐怖和酷刑使秩序得以恢复。1952年12月，在费尔哈特·哈什德^③遇害的第二天，在卡萨布兰卡爆发了抗议罢工；在一场被挑起的骚乱之中，有四五个欧洲人被杀害，导致博尼法斯先生对新生的摩洛哥工会运动狠下毒手，有五百名工人被屠杀。新宪政党、独立党虽说是资产阶级政党，但是它们毕竟代表着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意志，所以萨特尽管人微言轻，但仍竭尽全力地支持它们：他会见一些人士，参加一些会议，在杂志上发表文章。

有一种消愁解闷的方式是我的最爱：旅行。我没有看到我所想要看到的所有一切，有好多的地方，我去过之后还想再去。而朗兹曼对法国、对世界几乎没什么了解。我们俩大部分时间只是花在或长或短的旅行上。

我总觉得树木呀、石头呀、天空呀、色彩呀、风光的“低吟”呀，都将永远让我心动。看着卢瓦尔河沙滩落日，看到红红的悬崖峭壁，注视着开花的苹果树，凝视着广袤的草原，我仍然会像年轻时一样激动不已。我喜爱秋天到来时那悬铃木长藩篱下的灰中泛红的马路，或刺槐那纷纷的落叶；我喜欢外省那小城小镇，当然倒并不是想在那儿生活，而是为了穿城而过，为了留下回忆，奈穆尔或阿瓦隆的广场集市的那份热闹，低矮房屋幢幢相连的宁静的小街小巷，墙上爬着的蔷薇与墙头上方的丁香花的低语，真的是让我流连忘返；闻着割下的牧草的香气，看着翻耕好的田地，望着一丛丛的欧石楠，听着泉水叮咚，我真的是心醉神迷了。当我们时间

① 大部分文件都是捷克大使馆提供的。——原注

② 新宪政党的一百五十名成员与他一起被捕。——原注

③ 系突尼斯工会运动领袖，被“红手党”杀害。——原注